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学部大院里的“文革”旧事	徐兆淮
【史海钩沉】	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考	王复兴
【生逢乱世】	“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	吴 敏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学部大院里的“文革”旧事

· 徐兆淮 ·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大凡往来北京的人，只要一出北京火车站向右一拐，便立刻会醒目地注意到，在长安街建国门五号矗立着一幢新建的十五六层的大楼。进出大楼的人衣着随意，上下班时间也不那么整齐划一，既不像政府官员，也不像商务白领，大多倒像是些并不注意衣着打扮的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北京市各种款式新颖的现代时髦大楼如雨后春笋地屹立于长安大街上，建内五号那幢式样简朴、古板的大楼在后建的现代、新颖的大楼映衬之下，便显得格外陈旧和古板了。然而，当你得知出入这幢寻常楼宇的人，大都是国内一流的社会科学的精英和国宝级专家学者，相信你一定会对这幢楼宇和出入这幢楼的人群肃然起敬，另眼相看的。盖因时至今日，人们大约再也不会怀疑这些精英和专家们的学术成果和聪明智慧，毕竟曾经并继续地影响着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决策和文化走向。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革”前，它的正式名字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它学科齐全，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史、哲、经、法等十几个社会科学门类的研究所。学部大院和大院里的知识分子曾经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演绎了许多让人怦然动容、悲痛欲绝的奇闻轶事，这一切，对于现今的人们，即使是置身于学部大院里的年轻学者，几乎也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但这一切，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历史。作为一个亲历者，尤其是毕生难以忘怀的。

三四十年前，那时的学部大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学部大院里，只有七八幢二三层的小楼可怜地蜷缩在长安街上，最高的一号楼也只有三层楼，其余的办公室都是二层的小楼。那时的学部虽也聚集着一大群全国老专家、中青年学术精英，但却因“文革”的到来，而呈现出另一番非同往常的状态。这状态，不仅迥异于当今的学部大院，也全然不同于一向被称为“翰林院”和国家级社科基地的原本面目。而这不同所显示的，正是那段沉重而畸变的历史。

一九六四年八月，大学毕业后我满心欢喜地来到北京建内五号学部文学所报到，实指望苦读十年，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未料想，为十年从“四清”到“文革”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所累，到头来，我竟一事无成地离开学部，回到了我读书和出发的所在地南京，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职业和人生轨迹。

离开北京文学所已经五十多年了，如今我已年过七旬，白发满头，依旧忘不了在北京学部大院里的那段峥嵘岁月，忘不了发生在学部大院里的“文革”旧事。我知道，这并非是人老了总爱忆旧的缘故，实在是那段记忆里，不仅蕴涵了我个人的一段非凡经历，而且也牵动着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

◇ 大字报的海洋，大批判的战场

一九六五年底，我等刚分配来文学所的年轻大学生，从安徽的四清工作队归来。虽然自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已能感受到弥漫在文学界的紧张气氛，紧接着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随着文艺界批黑线专政论，批“三家村”，学部一些敏感知识分子已能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期征兆了，因而不免从内心常涌上几分不安的情愫，但从总体上说，学部大院里依然较为平静，从外表还看不到狂风暴雨即将横扫学部的征候，至少像我等这样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一帮年轻人，确实无法预料即将到来的运动风暴。

真正打乱学部的平静酿成学部动乱，并引发十年纷争的是学部党组织所主持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原来，自打报刊传媒猛烈批判“三家村”之后，学部被迫组织了一次关于杨述（学部政治部副主任）“青春漫语”的批判会。会议地点借在吉祥剧院，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正是在这次批判会上，发生平生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会议按原先计划安排发言不久，忽然有哲学所部分青年学者打破惯例，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强行发言，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党组书记关山复、刘导生等人搞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一时间会场搅成一锅粥，争吵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有人则支持冲击会场强行发言者。我和大部分人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呆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主持者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更让人意料未及的是，第二日在学部大院即贴出第一批大字报，一部分人反击冲击会场者，维护党组领导；另一部分人则揭批党组，揭批“保皇派”。记得以哲学所和《新建设》杂志为首的一批年轻造反派造反行动最为激烈。而学部机关一些党员同志则写大字报予以反击。其他大部分人则持观望态度。在一段时间里，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做无产阶级造反派，似乎成了不容回避的政治选择。直到六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之后，方才稍有平息。随后，在对各研究所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的造反行动中，谁也不愿再当保皇派了。造反和造反派成了最时髦、最激进、最革命的词汇。

学部大院大批判的第一个高潮始于运动初期对“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权威”、“黑帮黑线”等牛鬼蛇神的冲击与批判。这一阶段被揪斗的对象，不但面广人多，而且揪斗的方式，也是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实可称为这个知识分子成堆、专家学者聚集的学部大院里一道道奇异景观。

即以我所在的文学研究所而言，当时被揪斗批判的对象就有：文学所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现代室主任唐弢、当代室主任朱寨、古代室主任余冠英、理论室主任蔡仪、民间室主任贾芝、《文学遗产》陈翔鹤，罪名大体是“三反分子”、“走资派”，另有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等则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即使是崭露头角的一些

中青年研究人员如胡念贻、邓绍基、刘世德、曹道衡、樊骏、蒋和森等人也曾一度被大字报点名批评。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学部揭批“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动权威”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文学所所谓“黑线人物”、“黑帮分子”何其芳、毛星等所级领导和俞平伯、钱钟书等权威正处于被揭发、被批斗的惊恐之中。于是，在学部大院内常能看到这样奇异的景观：文学所何、毛、俞、钱等十余人在所里被批斗之后，先是由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地游街示众，此时，被批斗者大都戴着奇形怪状的纸帽子，胸前挂着大小不一的黑牌子。其中，何其芳的高帽子最为显眼特殊，黑牌子最为沉重醒目。率队游街时，还要一边敲锣，一边高呼：“我是三反分子、黑帮分子何其芳！”游遍学部大院后，还需一字排开，站立在文学所六号楼前，接受“革命群众”的责问与羞辱。至今我还清晰记得，钱钟书先生当时戴着一顶酷似古钱币式的纸帽子，被学部工人战斗队一水电工单拎出来接受批斗时的情景：严厉责问钱为什么不许他家高声开收音机，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云云。弄得钱哭笑不得，无以作答。

面对此情此景，我等一帮青年学子大都始则震惊困惑，不知如何是好，旋即就被一篇又一篇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所迷惑所引导，而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况，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深深地陷入到现代迷信之中。记得当时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朱寨同志曾好心地提醒我们，年轻时他在延安也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意谓切不可过于扩大打击面，云云。未料想，好心的朱寨立即遭到我等许多年轻学子的呵斥与批判。从此在很长时间内，便再也听不到类似的声音了。现在想来，真该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轻信而脸红后悔。

直到“文革”结束多年之后，我等中青年知识分子才逐渐醒悟到，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以至头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却不会思考，不善思考，总是期望伟人和先贤代替自己的思考。

按照常人平日对学部知识分子的印象，我觉得不管是老专家，还是青年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总是和蔼可亲、文质彬彬的样子，平日整座大楼里很少有高声喧哗与争吵之事，可是“文革”一来，整个学部大院仿佛顿时变成了沸腾的油锅与火场，一向说话低声下气，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好像完全变了样。一时间争吵声、辩论声、铜锣声、口号声几乎充斥学部大院的每个角落。大字报贴满了从一号楼到各所的墙壁上，会议室里，就连食堂也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让人连吃饭也难以安静消停下来。

还记得，运动初期，时在《新建设》杂志工作的刘再复来到文学所批斗何其芳的大会上，以浓浓的福建口音，声色俱厉地揭批何其芳的“三反”罪行，他的口才和胆识曾给我等文学所的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大约十年之后，“四人帮”一垮台，刘再复偏又阴错阳差地调到文学所工作，再后，还当上了文学所所长之职。真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着实让人难料。

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曾经亲眼目睹了学部大院里那一幕幕令人吃惊的怪异场面：文学所一位一向文质彬彬的中年研究员曾在全所批斗会上把厕所里的字纸篓强套在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的头上，一位平素温文尔雅的中年专家竟伸手打人嘴巴，以示革命的坚定态度。而亲手制作高帽子、黑牌子，强行戴在被批斗者的头上、挂在身上，迫使其在大院里敲锣打鼓、游街示众的也大都是些中青年知识分子。然而，大字报的威慑力和大批判的残酷性到此并未截止。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两派群众的出现，对立的增强，大字报和大批判给人的强

烈印象只能是：铺天盖地，触目惊心。这是我十年学部生活的最鲜明印象，也是我一辈子政治生活最为强烈的感受。

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总会对大字报、大批判留有特殊的感受。在我看来大字报本是中国在特定背景下大众表达民主意见的一种方式，大批判更是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重要的形式之一。“文革”初期当人们惮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是《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鼓吹造反有理的社论，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大字报、大批判推到更为激烈、更为残酷的地步。于是，学部“文革”运动也与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大字报、大批判遂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并迅捷形成燎原之势。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岁月中，大字报、大批判早已是席卷全中国的寻常之事，但学部的大字报、大批判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面广量大，转换迅捷。如前所言，学部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部里的研究人员又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重点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写（抄）起大字报来，龙飞凤舞，千言万语皆不成问题，参与论辩，则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得文学所的祁连修用郑板桥体书写大字报，曾引起许多人称许，许志英抄起大字报来迅捷如飞，而哲学所的徐崇温参与论辩，真可谓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那段时节里的学部，从中心一号楼学部机关到历史所、文学所、外文所的各楼内外，举凡从走资派、反动权威的历史、现实问题，到生活作风的细节，直至吴传启、林聿时等人造反内幕揭秘，充斥了整个学部大院。

消息灵通，新鲜刺激。作为中央的一个部委，学部连接着中央各部委的中枢神经，又直接通向“文革”的指挥机关——中央文革。学部所贴出的一些重要大字报，每举办一些批斗活动，常能引起首都各派的关注与瞩目，常能反映来自“上面”的意向与动作。记得“文革”开始的两三年内，首都高校和社会各界常来学部观看大字报，参与大批判会，了解运动动向，而北京市造反派凡有重大联合行动，必力邀学部造反派参与其中，并名列首位。那段时日里，学部常能爆出轰动京都的新闻，风头真是出足了。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中央点名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学部贴出了一批“倒谢（富治）”大字报，当时我所在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队）参与其中，事情过去了四十年，至今我还记得我与其他“战友”，在学部一号楼前所贴出了一张题为《三个变色龙，一条小爬虫》的大字报，引起很大的轰动响应。那几日，学部大院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几乎成了首都众目关注的重大集会场所，学部门前的自行车停得里三层外三层，拥挤得公共汽车站也不得不改点设置。

文人提笔又动口，君子动口也动手。在人们印象里，平日学部的知识分子们好像大都是文质彬彬、气度优雅的谦谦君子，说话做事一副轻声慢语从容淡定的样子。可是，“文革”风暴一来，白面书生们好像换了个人似的，顿时性情骤变，脾气暴躁起来，大字报大批判几乎搅得学部大院鸡犬不宁，人人难安。那段时日里，优雅的风度少见了，平和的气氛骤减了。代之而起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当时学部大院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正是：“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受不完的罪。”平日感情很好的夫妻，因政见不同而反目，交情不错的朋友，转瞬之间便成了仇人。古人所言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时已变为“君子动口也动手”，武斗、谩骂的现象亦不鲜见。曾见过，哲学部的青年学子严家其曾在辩论会上被揪掉了头发。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因怀疑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而被抄家毒打。“文革”就这样把书生变成了角斗士，而学部简直成了角斗场。

◇ 红与黑的角逐，通天的造反派

大凡熟悉学部的人，大约都知道这里曾经流传过的一句话：“学部一条虫，社会一条龙。”这自然不仅是因为这里曾经聚集过一批文化水平高、学有专长的中青年才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这里有一批具有相当革命经历的老干部和学术成就杰出的学术权威。他们与中央级领导层有着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渠道，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和信息来源。

不消说，学部来自全国各重点高校的高才生们有着多么巨大的活动能量，当年曾经积极写大字报、参与大批判活动的中青年才俊，如美学家李泽厚，文学家刘再复、张炯、何西来、钱中文，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叔莲等人多年后都已成了活跃在文史哲经各领域内著名的学者专家。而那些“走资派”“老专家”们如何其芳、尹达、孙冶方、冯至、刘大年、任继愈等人，还有社科院院级领导人郭沫若、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及与中央文革王、关、戚等理论新贵有密切联系的某些神秘人物如吴传启、林聿时，则与中央领导层多少都保留着各种渠道的联系。所有这些能量与关系，都无疑增加了学部运动的复杂性、诡异性。

一九六五年前后，自打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严厉批示和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解放后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论之后，人们很容易就接受了所谓红线与黑线路线斗争的理论，紧接着到“文革”便出现了两个司令部的概念。受此理论的蛊惑，当时的许多人也往往以誓死保卫红线、揭批黑线为己任。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以人划线的理论与概念实在有悖于马列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常识，但在“文革”初期，大多数人却是对此理论深信不疑，并要“紧跟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即使学部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理论影响之下，学部一些资深的老干部和名噪一时的学术权威，早在运动初期，已被当做黑线与黑帮代表人物揪斗打倒，而蛊惑全国造反运动的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却异常活跃地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学部批判“三家村”和杨述“青春漫语”大会上，当哲学所吴传启、林聿时等人策动部分人会场造反，会后贴出造反大字报时，我和许多人曾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哲学所揭发有人秘密串联、暗中策划写大字报之际，人们这才怀疑这些人意欲何为，而当人们得知吴、林原与身处中央文革的关、戚过去曾合作署名“撒仁兴”撰文，现又相处甚密的背景：原来，吴、林在学部策动造反，是想在全国首举造反大旗，以便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与批示，获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学部“文革”运动如今已经逝去了四十多年，如果说，当年大部分人都对吴、林在学部策划造反的举动持有怀疑态度，那么，随着王、关、戚的垮台，人们已经大抵明白其中的缘由，而二〇〇八年当我读到《文革前十年的中国》（晋夫）中，披露了一九六六年前后“戚本禹、吴传启等后来红极一时的‘左派’也都到了上海进行串联”一段话时，我仿佛这才懂得“通天的造反派”能量和胆子有多大。

正是在这些自称为红线、自诩为“左派”的通天造反者指挥下，学部的造反派从学部杀向北京，一会儿参加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一会儿又成了揪斗陶铸联络站的重要成员。最终，在成立北京革委会时，夺得了诸多实权部门的领导权。哲学所的周景芳成为北京市革委会的重要领导成员，文学所的涂某也掌管了《北京日报》大权。

作为一个学部运动的亲历者，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在所谓红与黑的残酷角斗中，谎言肆虐、空话连篇，权利欲望的恶性膨胀、人性的极度扭曲。在这里，我也见识了一些革命口

号喊得震天响、文章写得颇为出彩的“左派”们是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欺骗群众篡夺权力的。

红与黑的角斗，两条路线的理论曾经毒害过许多青少年学生，也迷惑我等刚入学部的青年学子。直到我在学部目睹了这一理论蛊惑下，一派群众组织的青年学子陈××仅因怀疑中央文革的王、关、戚是学部吴、林的后台，就被打得皮开肉绽，另一派群众的朱××抄家被发现有议论当时流行的某些理论，而被揪出批斗，最终采取迎面冲击火车卧轨自杀的残酷事实。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震惊不已，扼腕叹息。及至一九七一年在“五七”干校，听到林彪折戟温都尔罕时，我与一些青年学子，这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这一理论的正确与否。

红与黑的角斗，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给予了我等中青年知识分子终生难忘的启发和教育。让我们明白，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企望紧跟人头、紧跟路线，不辨是非、不动脑筋走捷径，终究会误入歧途，犯大错误，甚至犯了大错而不知错在哪里。诚实与慎重，仍应是应对人生难题的有益箴言。这当是学部大院“文革”经历给予我的最大教益。

◇ 大院军号响，老九操练忙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当学部运动也像全国各地一样进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之际，中央决定，派遣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占领并领导上层建筑。应当说，这既是运动的需要，也实在是无奈之举。此时的工、军宣队面临的是混乱不堪的一副烂摊子。斗、批、改已无法进行下去；群众组织对立情绪甚浓，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之中。

按理说，此时的学部正需要上级组织派驻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改变现状，使学部运动和工作步入正常轨道。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援引北大、清华之例派遣工、军宣队进驻学部。

派遣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和社科研究单位，是“文革”中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补救措施和权宜之计。时过四十多年，如今看来，用文化层次较低的工、军宣队来占领上层建筑，就如同“文革”中提拔劳模陈永贵来当副总理，让王洪文担任党的副主席一样，颇像是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其荒谬与可笑自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工、军宣队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学部之后，确也爆出不止让人哭笑不得，又让人不得不深思的奇闻。

首先是，文人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与军营化管理的鲜明反衬。也许文学所军宣队清瘦精明的薛队长和他部下那些来自农村的朴实战士，也许来自轧钢厂的工宣队壮实的丁队长和矮小的老李，还有胖胖的赵师傅和高高的王师傅，在部队在工厂原都是不错的军人和工人，但当他们接受派遣来领导、管理学部的老干部和社科研究人员，让那些白发苍苍、行动缓慢的老干部、老专家集中在办公室里，打地铺睡在水泥地上，令一向自由散漫的文人们，听命于军号声而早起，集中出操，排队吃饭，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这情景这场面本已显得滑稽可笑了，而透过那些悲喜剧，又怎能不让人悲怆痛心？

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当时的我感到既陌生又新奇。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虽然对于排队吃饭，饭前要唱语录歌，课间要跳忠字舞，颇感不适，要完成听军号声出操之类却并无多大困难，而对于像何其芳、陈翔鹤那样的老干部老专家则就困难多多了。这两位都是年近六十岁、身材矮胖之人，即像睡地铺起夜、听军号出操，也就着实难为他们了。难怪当时就传出，陈翔鹤起夜困难，只好用茶缸接尿，而何其芳则因操练不济，常受到不明事理的小战

士训斥。而那些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小战士，哪里知道年迈尿频本属老人常见病，而早在抗战时期，何其芳就在延安参加过贺龙将军的野战部队。

作为学部的年轻学子，“文革”中我参加被某些人嘲笑为“鸡”派（机会主义）的红卫兵总队，这派群众组织主要宗旨便是始终反对吴传启、林聿时等“左派”及其后台王、关、戚。一九六八年前后王、关、戚相继垮台后，我又参加过清查“五一六”专案。大约正因如此，工、军宣队进驻学部，便让我继续参加专案组工作。既搞历史专案，又参与清查“五一六”专案。正是在专案组期间，我接触了钱钟书、陈翔鹤及王春元等人专案。其间，亦曾发生过一些值得一记的轶事。

关于钱钟书现行言论的审查与结论。对于钱先生的历史与学术成就，即使是“文革”中亦未有多少异议，当时有大字报所揭发的现行言论却多是置人于死地的现实“罪行”：其一是有人揭发钱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时，曾说过我不把翻译《毛选》工作带回家做，是怕亵渎了我的家。其中“亵渎”二字是用英语一词说的。其二是，有人检举钱说过一段关于厨房政治的话语，大意谓：食客吃菜不要光看厨师端出来的菜肴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你却不知道，在厨房烹饪时是多么肮脏！政治大体如此。文学所凡是了解钱先生为人的人，大都知道钱先生出于留学习惯，平日说话喜好幽默说笑，有时不免失之刻薄，其实并无多少恶意。因此，给钱先生做现行结论时，便以第一条属孤证，无法做结论，拟作推翻；第二条属于错误言论，错误在于未能区别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谁都知道，在当时情况下，第一条属恶攻，是死罪；第二条罪名，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政治斗争本就很难离得开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甚至污血与肮脏的。何况，钱先生说此话时，亦只是泛泛而论，并无具体指向和特定背景。

关于陈翔鹤之死。陈原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沉钟文学社的重要成员、《文学遗产》主编兼历史小说家。他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风行之后，尤其是在“文革”前夕，却遭到严厉的批判，被视为“影射文学”的代表作。工、军宣队进驻学部之时，陈已年届六旬，身患重病，却要被迫与大家一道住到办公室地铺上，身心既已疲惫不堪，加上所里连续举办批判会，逼迫他承认影射问题。陈终于被迫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致死。陈之死未留任何文字或言语，工、军宣队却无端地为之做出了“服毒自杀身亡”的结论。进而影响到他入伍的子女和家人。在那个野蛮的时代，即使是冤屈自杀，被迫自杀，自杀者及其家人，也会遭到不该有的骂名与待遇。这当是那个非常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

在专案组，除了参与对资深老专家历史旧案的审查外，我还接触了“文革”新案——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的清查。“文革”过来人大约都明白，“五一六”反革命一案是“文革”中历时最久、波及范围最广，又屡经中央下达清查文件的一个大案件，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谜团。如今时过境迁几十年，作为参与清查的当事人，仍然还有不少难以消除的迷雾，让人看不明白。

首先点到“五一六”兵团的，乃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而我最早听说“五一六”兵团则是一九六七年冬季。该兵团似乎是由少数走极端的青少年学生组成，意在宣扬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思潮。随后听说学部红卫兵总队在法学所办了清查“五一六”专案的学习班，已向中央报送了清查“五一六”的材料。学部俨然已成了“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虽然，我所也为涂××、外文所也为兴××办过学习班，但所交待材料，大多仍扑朔迷离，似是而非，一时间委实难以判断真伪。直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接受了有关专案材料，中央紧接着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又发布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部署在全国开展揭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而在全国形成风声

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作为学部运动的亲历者，连我也搞不清，到底是学部误导了中央，还是中央文件误导了学部和全国各地。最终清查“五一六”简直成了一笔糊涂账，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以至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自杀身亡了。

在工宣队胖胖的老赵师傅的主持下，我与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小张共同参与王春元和张×的“五一六”专案工作。那时节，所谓清查、办案通常不过是背诵语录、政策攻心及轮番上阵、疲劳轰炸。所谓语录无非是毛主席关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语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之类，显然都是一种针对阶级敌人的有罪推定，而非无罪审查。至于政策攻心疲劳轰炸，那就让人难以承受了。一次对王春元连续攻心二十多小时之后，已是深夜两三点钟，我实在吃不消，就找了个地方休憩了两个小时，后来被军宣队小战士小张发现，竟把我找去训斥了半个钟头，大意是清查“五一六”就是对敌战场，你随意离开战场不就是临阵脱逃么？被小战士如此严厉批评后，我心中虽有不平不悦之感，但一想到像何其芳、朱寨那样的老革命、老干部都动辄挨训，我等小子还有什么怨言呢？

拿这套简单化的斗争方式，对待并无实证的所谓“五一六”分子，自然毫无成效可言。王春元和张×都是颇有人生经验的中年人，虽然面对工、军宣队如此强大的阵容，并无惊慌失态之举。大体说来，王春元更能沉得住气，任你发火猛批，他从不硬顶，也不乱供。故而审查后期，审查者与被捕者几乎成了要好的朋友，并无多少芥蒂。而张×在清查时则又是另一副架势，他能口若悬河地诉说交代，也能痛哭流涕地下笔千言地写上一摞交待材料，当然，那些材料虽然繁冗，却大都无法落实。以至清查后期，所谓“五一六”一案即将撤销时，反过来还要动员他自己收回、否决那些水货材料。

直到干校后期，一九七一年林彪折戟于温都尔罕之后，我等知识分子这才如梦方醒地悟到，正像运动初期制造的批吴晗《海瑞罢官》、批彭陆罗杨案、批萧杨余傅案、批刘少奇案一样，折腾了三四年之久的清查“五一六”案，原来也是一场历时既久、波及面甚宽的冤假错案。所不同的是，前者整的大都是党内高级干部，而后者挨整的却大都是响应号召参与造反的群众组织。一场打着革命旗号的文化运动，就这样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几乎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整整被折腾了十年之久。是耶非耶，岂不更值得全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深思么？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学部运动正处于斗批改和清队阶段，随着林彪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与学部所有人员，扶老携幼、连家带口，全部被疏散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离开学部大院那几日，我常带着留恋的目光打量学部大院里的一号主楼，还有文学所的六七号楼，那里曾经寄寓着我期望当学者专家的梦想，如今我知道再也难以实现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愫不由地泛上了心头。

◇ 大院里的新角色：木匠与清谈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广大干部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一年之后，借助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学部统统被赶到河南“五七”干校。不过，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就不仅是轮流分批的问题了，而是包括像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蔡仪那样的老弱病残。随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

当然，当年下干校时，我等一千青年知识分子尚是懵懵懂懂地明事理，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归宿在何方，一切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我们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思考“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还记

得，在明港军营里传达林彪事件时，我们或坐在床边，或坐在马扎上，整个会场寂静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然而，我们的内心却震撼无比，仿佛顿有大梦初醒时的彻悟。

一九七二年夏，我们在干校折腾了两年半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学部大院。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生活秩序已非昔日可比。一九七二年九月前后，随着工、军宣队奉命撤出学部，再也听不到军号和出操之类的军事条令了。整个学部好像进入了运动的间歇期和调整期。没有昔日的喧闹，当然也没有“文革”前浓浓的学术空气。清查“五一六”行动已陷入停顿，学术资料室、图书馆仍然关闭着。研究工作当然无从谈起，但学部知识分子内心积聚的苦闷终究需要宣泄，长久储存的能量终究需要释放。于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学部大院终于出现了一些与国家级社科研究基地极不相适应的奇异景观。或者可说是在短暂平静的背后，又悄悄刮起了三股异样的风潮。

其一是乒乓健身风。每日清晨，或是午休、晚饭之后，总有一批年轻人聚在乒乓球桌前，羽毛球场上，打球健身，消磨时光。这时候，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大抵已消除殆尽，过去的争执辩论也已不复存在。我素来爱打乒乓球、羽毛球，且在所内一直排名前三强，此段时日里，我的乒乓瘾不仅得到极大的满足，而且还常与对立派的张炯、王春元过招，几乎忘掉了过去的芥蒂。而在羽毛球场上，竟也吸引了像许志英、王保生、董乃斌、何西来等不太喜欢运动的人满怀兴致地投入进来。当然，也有不少人借打扑克、下象棋打发时光。这大约是十年“文革”中，我度过的最轻松、最逍遥的时光。当然，也是我辈知识分子思想由迷惑到清醒的重要阶段。而每每在打球之后的深夜里，总希望能找一二知音诉说心中的郁闷。

其二是打家具风。平日里，人们常把读书人看作是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无用之人。在干校两三年的日子里，人们总算看到知识分子也能学会种田盖房等劳作，现在回到北京实在无事可作，又满腹怨气时，我们终于又找到一种发泄方式。那就是自己打家具，并在文学所蔚然成风，成为一道景观。于是，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那段时日里，我等文学所中青年知识分子又再次转换了自己的角色：由中青年学者变成了能工巧匠。那段时节里，我几乎整日就想着怎样对付斧子、锯子、刨子和凿子、钉子，谋划榫头与榫头的对接，我将所有精力发泄到即将打造的某一件家具中去。那一年夏天，当我在文学所在学部大院空耗、白待了十年之后，我已决定告别学部，调回江苏工作、安家。有时当昔日干校的“战友”应召去开会之时，我一人把自己关在六号楼一间铁皮门办公室里（自干校回京后，我等单身汉无处安身，只好住在办公室里），挥汗如雨地打造家具，以作回宁安家之用。

那一年里，我陆续打制了一个碗柜、一个半截柜、一张大方桌、一个床头柜，还有两个小方凳。我知道，我的手艺不算好，在文学所家具打得最好的无疑当推许志英和裴效维，他们一个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一个是北大的高才生。许打的半截柜，裴打的沙发，真跟家具店里买的差不了多少。如今，我的一本书里，还夹着一张沙发设计图，那便是我临离开北京时，裴效维帮我设计的。如今，调离北京和学部大院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仍保留着一些自己亲手打制的家具，盖因那些简陋的家具里，寄寓着一个特殊年代里我的难忘记忆。

其三是清谈议政风。中国古代读书人中似乎早就流传着一句话，叫做“身居乡野之中，心在庙堂之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学部知识分子虽然因“关心国家大事”而吃尽了苦头，虽然也在一段时期内，被迫当过逍遥派，在玩乒乓、打家具中宣泄了心中的怨气，但大多数人都还不是消极出世者，胸中仍跳动着一颗爱国爱民的红心。即使是在林彪、“四人帮”肆虐之时，他们仍然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国家的命运。平日里，或午后或夜间，总有三五人或七八人围聚在一起，议论学部运动的走向，更议论朝政的得失，甚至中央高层人事的悄然变动，而且往往也大抵分析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

最让人惊奇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前夕，何文轩回关中探亲，临行前，参与清谈议政的核心人士许志英、栾勋等人就预测到，等到何探亲归来，或许那几个红得发紫的人，就要“完蛋”了。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真不出所料。难怪有人称他们时常参与清谈议政者为“清谈组”，也难怪有人说，清谈组的“常委”倘有机会进中央政研室，一定干得并不逊色。

离开学部大院已经三十四年了。如今我还依稀记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离京那天，北京的冬天已经来临，天气灰蒙蒙的，风沙渐起。想起一九六四年八月满怀心志来文学所报到，蹉跎十年后离京之际，除了自己所打制的几件家具，在业务上，我几乎一事无成、空手而归，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难言的酸楚与落寞。我并不后悔来到学部文学所，十年的学部生活毕竟让我见识了许多，学会了许多，而这一切又是别处别时难以给予我的。

亲历了学部“文革”运动之后，即使是调离了学部，我仍不时地拷问自己。“文革”之中，当极左之风盛行、兽道肆虐之际，学部知识分子却在相当长的时段里，陷入集体无意识和集体哑语的状态之中。这种哑语和哑语背后的怯懦通常表现为初期的迷乱困惑，继而是迟疑、探索，最终才是清醒、彻悟。较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林昭、张志新和学部的顾准等人，我辈青年学子就显得过于懵懂、迟钝，更缺乏坚毅与勇敢。一位当代作家在回顾自己文学生涯时，说过一段充满激情又颇有见地的话语：“有识见容易，有胆识很难；耐得住长夜的寂寞更难。由于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掷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以为，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遗憾，更应是我辈知识分子的最大遗憾。一位伟人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要记住历史，便尤需要不断拷问自己和自己的良知。

□ 来源：《悦读 MOOK?第十四卷》，褚钰泉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

~~~~~

## 【史海钩沉】

### 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考

• 王复兴 •

#### 一、1967年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并辞职

1967年二月、七月、八月，聂元梓曾在不同场合三次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本人辞去校文革主任一职。此事是北大文革史中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但却长期被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们所忽略。此事是否发生过？此件在当时看来的逆天之举，其背后的动机究竟为何？其后果是什么？此事对北大的文革运动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探究。

2018年4月25日上午十点半，我到聂宅看望聂元梓老人，向她讨要她新出的书《我在文革漩涡中》，同时约了她儿子大胖聊天。老人已97岁了，记忆力衰退得很厉害，说话缓慢、吃力，但精神尚好。笔者获赠新书后，主要是和大胖交谈。大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一个多小时，话题只有一个：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忽略了聂元梓要解散校文革这件事。大胖认为这件事是北大文革中一件具有根本性质的大事。聂元梓后来挨整；陈伯达6·5讲话挑动北大分裂；8341、迟群、谢静宜进北大后狠整她，皆与此有关。文革之初，“最高领袖”给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那么高的荣誉，把她树为文化革命的一面红旗，她却要中途“撂挑子”，想退出运动不干了。在中央眼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上面”、还有中央文

革会怎么看这件事？“上面”应是很愤怒，于是一直整她，但又从来没有公开批评她这个问题，从未提过，这是为什么？因为不能明说，影响太坏。大胖说这些话时，她母亲默默地坐在一旁听，没有打断大胖，也没有说出任何不同看法。此时我猛然想起，14年前，2004年夏天，我在文革后首次拜访聂元梓时，那时她记忆力很好、头脑清晰。那次她曾很认真地对我讲起，她当年曾公开提出解散校文革、本人辞职一事。认为这件事很重要。我前、后联系起来思考，认为大胖对我所谈，是表达了聂元梓真实的意思。

2014年4月一次在北京与校友聚会时，我曾向中文系校友索世晖提及此事，索马上反应：“确有此事，时间大约在1967年2月底，地点在临湖轩。我参加了这个会，会上聂要解散、辞职，遭到一致反对。”索的回忆印证了我的记忆，确有此事，我们俩人都在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会议是聂元梓召集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各系战斗团团长及部分战斗队代表的联席会议。记得我当时还寻思：“她怎么这么糊涂？！”索世晖当时是“公社”的中文系战斗团团长。他后来于2018年5月与我聚会时再次议及此事，回忆说，在那次临湖轩开会之前，有一天在聂元梓办公室，有他、聂元梓、魏杞文，她靠在沙发上，说文革太复杂了，自己领导不了学校运动，想建议解散校文革，自己辞职，不当校文革主任了。当时魏杞文坚决不同意，反复劝说她……

以上即聂元梓于1967年2月底第一次提出解散、辞职的建议并被“公社”的群众否决的情形。此后，聂不甘心，又两次提出该建议。她在《我在文革漩涡中》（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10月出版）一书的264页至267页写道：

骑虎难下，欲罢不能

说实在的，文革初期，我曾经兴奋过，以为有了真正发表自己的意见、改善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了。但是，此后的运动发展却使我越来越困惑。到了夺权阶段，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产生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我觉得，把那么多老干部统统打倒，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武斗越打越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作为北大校文革的主任，自己对许多事情都想不明白，还怎么领导全校师生员工把运动进行下去？

既然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搞糟了，对毛主席信任和重用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产生了怀疑，我就逐渐不愿意紧跟毛主席了，我对毛主席的崇拜思想开始动摇。

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天（大概是6、7月），……。我去看杨惠文，和杨惠文说了这些想法，想从运动中退出来，不干了。杨惠文说，你别看现在搞得这么乱，毛主席到时候有办法收拾。你要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想个办法，说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再出面了……。杨惠文劝我退身避祸，这些话说得都对，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了。

按照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到一九六七年夏天，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该夺的权也都夺了，该回到正常的秩序上来了。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我做了学校里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的工作。虽然我个人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终于没有成功，派性越来越厉害，全校的局势恶化。全国各地都是群众组织分裂，发生严重武斗，“文化大革命”形势十分混乱。

我认为这样继续下去，结果必然难以收拾。在一次校文革常委会议上，我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我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谁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

当我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里马上有人提出反对，说我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大家都拥护这种意见，我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提议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但我还是没有改变主意。过了没几天，八月中旬在有周总理出席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接见会上，我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当时，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很严厉地训斥我，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我怎么办？其实我不是怕有人攻击校文革，而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我想退下来都不行啊。我要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早就撂挑子了。毛主席肯定过我们的大字报，给我那么大的荣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毛主席提出让我负责成立“校文革”的，我不胜任、不想干了，也不能一甩手就下台，不能随便撂挑子，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的党内组织观念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既然江青明确表示了态度，周恩来等领导人也都默认了要我继续当校文革主任的意见，我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沉浮，不可能不犯错误。

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预审中，我讲了当时我的这种思想状况，我说，一九六七年秋季以前，北大校文革所犯的错误不论有多大，我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认真检讨。但是，从这次接见会上（周总理在场），江青不准我辞职，形势所迫，我不想干都不被允许，那么，对这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无论错误多小，我一分责任也不负……。我是完全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被逼无奈，勉为其难。

以上即聂元梓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在校文革常委会、八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时，第二次、第三次提出解散、辞职的情形及其心理活动。这些史料，将来研究文革史的人们可在中央文革小组相关的接见会议记录中以及聂元梓刑事审判案的预审记录中，进行核实。

聂元梓做为一名行政级别十二级党的高干，做为一名曾经历过延安整风并在“抢救运动”中曾“被抢救的失足落水者”，她的想法与一般的大学生自然不同。她当时内心深处的想法是什么？在革命的狂飙年代，她有什么“阴暗心理”？大胖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对我的长谈中有深入披露。

大胖说：“一九六七年夏季，我妈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带我去杨惠文家（聂与杨惠文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无话不谈的好友。）我妈和杨惠文、白介夫（杨的爱人、老干部、北京市革委会成员）三人议论时局，观点一致。三人共同认为：当前是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左倾错误，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风还厉害，还左。我听了大人的议论，万分震惊！（大胖当年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大胖还说：“我妈说，准备向中央提意见。杨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这么干，会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绝对不行！但你可以想办法退出运动。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辞职不干可以试试。’”

聂元梓放弃了风险太大的“提意见”的行动计划，而尝试解散、辞职、退出运动。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我回北京探亲，曾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二十七日两次看望聂元梓和她的儿子大胖（于晓东），并与大胖进行了详谈。我问大胖，聂当时认为中央文革打击一大片是错误做法，这想法怎么形成的？大胖说：背景是当时社会上各级领导已全被炮轰、打倒、瘫痪了。母亲认识的所有亲戚、朋友、老领导凡是高干的，全被打倒了。她姐姐聂元素（大胖的姨）让老保姆把她被打的血衣送过来，托话：‘如果我死了，绝不是自杀，说是自杀别信。’（聂元梓一直保存这件血衣，后来工宣队抄家时搜出这件血衣，批判聂有阶级仇恨，

要翻天算帐。) 大胖的三舅(聂元梓的三哥)在北京内燃机厂当副厂长,曾向聂元梓哭诉,说他在厂里被批斗,挨打,受折磨,哭着要聂元梓向中央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

聂元梓说:文革其实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我想,她这话有一定道理。在中央层面,除了他老婆及个别人,谁会在内心与他真正一致?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表面上跟的最紧,内心的真实想法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照林彪,也就不难理解聂元梓的真实想法。以上披露的就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的真实的内心世界。文革之初,只有单纯、幼稚的大、中学校学生,才会被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所煽动,所裹挟,一哄而起造反,但他们逐渐也冷静了下来,不断地思考,逐步走向了觉醒。到了1976年9月初,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他便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人一走,天就变了。

## 二、新北大公社1967年的反左倾向

1967年,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本人辞去主任一职。表明她在内心深处对文革的不满与抵触。因而在领导北大运动时,便自然地表现出反左的倾向。这是一表一里的关系,反左是表象,里子是对文革不满、抵触。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是许多复杂事物的共同现象。1967年,北大文革运动的主要政治倾向、大潮流是:两派共同反右倾机会主义,共同批判刘、邓资反路线,共同炮轰中央及各省市的走资派,共同坚持反陆平、反工作组。这是大潮流,无人敢逆流而上,逆潮流者势必粉身碎骨。然而在这一主倾向、主潮流的另一面,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北大校文革以及“新北大公社”的骨干力量,确实存在反左倾向,这是历史事实。这是1967年在北大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

由于聂元梓在内心深处对文革很不理解,有抵触,于是在领导北大运动时便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她三次公开提出解散校文革、本人辞职不当校文革主任即是证据。提出文革委员会解散、辞职,这在中国文革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事件。此事没有实现,如果实现,定会惊天动地……正因为聂元梓对文革有所抵触,因此在领导北大的运动时,表现为保守,反左。被江青于1967年1月16日批评为:“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笔者认为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这是聂的“最大错误”,但笔者并不否认聂元梓、校文革在1967年1月以后仍犯有其他错误。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在1967年1月以后曾继续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批判“走资派”。校刊《新北大》也曾刊登过“揭发”“批判”党、政、军领导人的文章。但必须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判,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须事实求是地进行分析。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的1967年,全国人民狂热崇拜毛泽东,全国上下炮打刘邓司令部,这是大气候、大潮流。北大两派师生,包括聂、孙,都只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炮打“走资派”,否则就是立场错误,“大逆不道”,甚至会粉身碎骨。问题的关键点是,是否早在1967年,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曾经有过鲜明的反左倾向、反左潮流?历史的事实是:它确实发生过!存在过!是许许多多北大校友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这即是当时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当年的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反左,不仅是他们头脑中的兴奋点,也是他们行动中的用力点,这样做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因此人们非常注意策略和隐蔽性。早在文革初期的1

1967年，此一在北大文革中出现的闪亮的历史正能量，难道不应把它挖掘出来，做为益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发展史的健康因素，予以认真总结吗？

应该如何历史主义地看待北大文革史中聂元梓的反左？哲学家王若水的分析很中肯，王若水在《聂元梓回忆录》的《序言》中指出：“聂元梓在‘文革’期间采取了抵制和反对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立场。她作为一个有政治经验的老干部对当时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考虑，而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是和那些单纯的、狂热的红卫兵不同的。尽管如此，她却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对毛泽东的盲目的个人崇拜，不能不追随毛泽东参加“造反”。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到了后期，她也陷入困惑之中，想要摆脱却身不由己了。”王若水对北大运动很了解，其分析亦客观、中肯。

新北大反左，此事的权威性证据，即江青于1968年初多次批评聂元梓：“我让你反右，你偏反左！”1968年3月2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打倒杨、余、傅。首都红代会代表列席了会议，北大聂元梓、马云龙参加了此会。江青在大会发言中说“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并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要反左。”第二天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传达了“3·22”林彪、江青的讲话。（2015年4月笔者在北京与马云龙当面核对了江青在此会议讲的这句话。马说江青确实讲了这句话。他记的笔记。）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倒杨、余、傅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讲话时，又一次公开批评聂元梓，说“聂元梓谁的话都不听，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次大会上中央首长的讲话记录，一定还保存在档案中。档案总有解密的一天。

就在江青多次批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那段时间，聂元梓在俄文楼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政治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引自《聂元梓回忆录》中《我的上诉状》）这证明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极左已上升到一定程度的自觉状态。而当年新北大这种反左的立场，是上下一致的，例如“新北大公社”的“红梅战斗队”就曾于1967年5月底贴出过一份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指出反极左是斗争大方向。把“极左”加上“反革命”的冠词，是暗指林杰、关锋是吴传启后台。

今天反思文革，当年反左无疑是个正确方向，因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新北大坚持反极左，是朝着正确方向逐步觉醒。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孙、“公社”群众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还跳不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也认识不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是毛。

当年新北大、聂、孙反左，集中表现在反吴传启，反王、关上。当时不可能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关锋，因此新北大、聂、孙的策略就是公开地打击王、关的马前卒吴传启，以此来抵制其后台王力、关锋。但这并不等于主观上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而当时“公社”总部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但客观上是反了中央文革路线的。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下面捋一下聂、孙、“新北大公社”直接反王关戚的史实。看看1967年3月下旬、4月10日、5月27日、6月1日、6月5日，先后发生的重要事件。3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李玉英到解放军报社找李讷，向李讷着重谈了有关林杰、王力、关锋等人的问题，递交了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王力、关锋两次打电话向孙蓬一施压的电话记录。4月10日，聂、孙求见中央文革后去了钓鱼台，见了江青、陈伯达，向江青告状，告

了王力、关锋。孙蓬一在接见时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5月27日，陈伯达在钓鱼台单独召见聂元梓。关锋、戚本禹在座。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我们非常希望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关锋则威胁说：“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的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会面不欢而散。（据《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二章第3节，聂在书中说此次接见是5月28日，有误，经核对是27日。）这次“5·27”谈话十分重要，有几点值得注意：1、陈伯达明确让聂元梓“不要反吴传启了”；2、陈伯达以陶铸为例，指出反吴传启就是反关锋；3、陈伯达要聂与中央文革“合作”，隐含政治交易之意；4、如果聂不听话，不上他们那条船，会怎么样？关锋出面把狠话撂下了：“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这是对聂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文革后的2004年夏，聂曾对我讲：“中央文革、陈伯达要我上他们那条船，我不肯。于是整我。”聂所指，应是此次“5·27接见”。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从1967年3月至6月，多次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反映吴传启等人问题的材料。6月1日，“除隐患”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吴传启的第一批材料。仅仅五天前，陈伯达刚刚于5月27日对聂讲过“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指中央文革）与他们（指吴传启等人）联系起来。”可是仅仅五天之后“除隐患”便公开炮打吴传启。

在陈伯达眼中，聂、孙、“新北大公社”太不听话，于是在6月5日陈伯达发表了两次谈话（一次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一次是6月5日晚至6日凌晨在人大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时。有校友说只有一次讲话，是在人大大会堂，但据笔者考证是两次讲话，与聂的记忆一致。），陈在讲话中狠整聂、孙、狠整“新北大公社”。

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陈伯达在人大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如此上纲上线，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

在6月5日晚上陈伯达于人大大会堂讲话之前，在6月5日清晨，他曾首先到北大大饭厅，对聚集的学生和闻讯赶来的聂元梓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不行啊。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回忆说：“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聂元梓口述自传》第十五、十六章中，引自博讯文坛，编者谢冀亮）。

6月5日之后，6、7、8日三天，“井、团、零”出世，与5月建立的“红、飘”汇合，形成了有规模的反对派，后来组成“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中央文革、陈伯达以这种方式牵制、阻挡新北大反左、反王关戚。你新北大不听我中央文革的，我就让你后院着火，分裂！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主要是在校外，而不是针对校内，是矛头向上。斗争方向是反极左。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广大群众是冒着巨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吴传启（明反），反王、关、戚（暗反）。在当时的形势下，新北大反左、反王关戚，不可能公开亮明旗帜，只能以曲折、隐蔽的方式进行，因此是被掩盖的一种倾向。同时应指出，当年北大“井冈山”的许多师生也曾对林杰、关锋、谢富治不满，有着反左情绪，但总体上远不如“公社”强烈。

新北大、聂、孙与学部联队吴传启之间从1967年1月夺权风暴开始出现的斗争及其发展，笔者在下面择要捋一下：

1967年1月新北大奉周总理指示到高教部夺权。碰上《红旗》的林杰、学部联队的吴传启、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搞小圈子夺权，拉一派打一派，支持高教部“延安公社”的卢正义夺权。而卢正义有历史问题是叛徒，确实在狱中出卖过同志，因此遭到聂元梓、新北大坚决反对。而后王力、关锋严厉批评了新北大，聂元梓随后带领北大师生态撤出了高教部。

1月15日，学部民研所的洪涛、刘郢在学部吴传启支持下，把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机密档案抢劫一空，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民族学院以郑仲兵为首的“抗大公社”和统战部群众把洪涛、刘郢等人扭送公安部，洪、刘却得到了谢富治的保护，第二天就把人放了，并发表讲话封抢档案的人是左派，反过来把反洪涛打、砸、抢的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关押了十几天。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从此，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与聂、孙、新北大公社成为反吴传启的坚定战友，并都对谢富治不满。

4月8日，在民族宫批判修正主义民族路线展览会的筹备期间，地院“东方红”等高校的地派，在学部吴传启、洪涛等人支持下，于8日下午包围了北大学生进驻的民族宫，对“新北大公社”学生实行武力清场，于9日凌晨3：30把北大学生全部赶出了民族宫。北大校友杨子浪在其公开发表的《文革日记》中，对此有详细纪载，他是武力清场的受害者。他在日记中写下，他认为地派武力清场的后台是：吴传启、洪涛、卢正义、徐非光。当时有北大学生在民族宫，亲眼看见了洪涛在场。

4月11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六所高校的宣传车，闯入北大，大喇叭高喊：“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聂元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后来外校地派这六辆车被北大学生扯掉了广播线，变哑吧了，并把六辆车推出了北大校门。

“4·8”、“4·11”事件表明，由于新北大公社、聂、孙反对学部联队潘、吴洪一派到处伸手抢权，搞打、砸、抢，因而他们便拉一派打一派，煽动地派学生反新北大。反新北大的后台就是王、关、戚、谢。

以上通过1967年1月至4月的一连串社会冲突事件，表明聂、孙、“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已从反右转向反左，从反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走向反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吴传启、王、关、戚、谢富治。孙蓬一的“4·12”演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4·11”地派六辆宣传车闯入北大挑衅后，北大学生群情激奋，孙蓬一于4月12日在大饭厅召集“新北大公社”全体大会，并发表演讲。这个演讲是反极左、反吴传启的宣战书，不指名地抨击了学部联队一派的后台王、关、戚。孙在演讲中说“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孙指出他们的手法是“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指出他们在搞小圈子，排斥异己，到处伸手夺权。孙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显然不是指吴传启等人，他们不够资格、不够份量，而是指“大人物”王、关、戚“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4月12日孙蓬一演讲之前，有一个小背景：聂元梓在其《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十一章第6节中写道：“晚上，我召集了校文革及其他有关人，有孙蓬一、李清崑、姜同光等（记不清还有谁了）开了五、六个人的小会，让他们对当前运动中



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清醒认识。我讲了文革形势和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的问题。”（注意，聂点名讲了四个人的问题。）孙蓬一的演讲，是把聂、孙等人小范围的议论，捅到了大庭广众之中。此一背景证明了：孙蓬一的演讲，其矛头所向，是非常清楚、明确的。

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于1967年反极左，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是北大文革史的一大亮点。新北大当时客观上已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主要的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主要矛头不是指向党、政干部中的“走资派”，而主要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政治倾向主要不是反右，而是反左。但在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毛主席、中央文革的革命路线，这是其历史的局限性。

### 三、结束语

北大的文革运动不同于清华、地院、北航、北师大。这四所大学与其他绝大多数高等院校一样，是学生领袖领导着文革运动。而北大不同，由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背景是北大的社教运动及后来整社教积极分子的“国际饭店会议”，因此在文革爆发前夜，北大便已形成了一支以哲学系干部、党员教师为骨干的造反派力量。第一张大字报的七名作者，便是由这些人组成。而清华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主要是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多天”内由反王光美、叶林工作组的蒯大富等学生领袖主导了。在北大文革前期的二年多时间，领导北大文革运动的是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一批党员干部、教师、研究生，而不是学生领袖。因而北大的运动便相对地理性，并不激进，并被江青于1967年1月16日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为：“太温了”；更被对立面“井冈山”攻击为“保守”，是“最大的保守派”。“井冈山”是站在左的立场，批聂“保守”。“井冈山”的主流思潮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彻底砸烂旧世界。认为聂、孙、校文革、“公社”是“旧世界”，要“砸烂”。因此提出：“二次革命！”“全面夺权！”的口号。这两个口号当时曾被“井冈山”贴满了全校园。“井冈山”与“公社”，当时分别表现为一个偏左、激进，一个偏右、保守，当时的北大政治生态即是如此。但应指出的是：“公社”的师生同样在阶级斗争观念的浸染之下，视“井冈山”的同胞为“敌人”，誓要将对方摧毁、吃掉。两派没有政治正确的一方，都错。

校文革、“公社”偏右，这是由北大校文革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特点。对于这种区别，举个例子，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学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第一批红卫兵（人们称为“老兵”）在北京市到处打人，甚至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市公安局披露的数字）。而同样由高干子弟为骨干所组成的大学“保守派”红卫兵“一司”、“二司”，却很少有打人的记录，更无打死人的事例，只是坚决“保皇”而已。这便是由于年龄的差别、文化程度的差别，而表现出的不同的理性程度，或者反过来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非理性的激进状态。北大的文革运动有其独特的特点及特殊性，这是由其物质基础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再比如孙蓬一的“4·12演讲”，便不可能由学生造反派头头口中道出，包括同是天派的蒯大富、韩爱晶，他们还不够成熟。孙蓬一的4·12演讲，以大无畏的反潮流姿态，反左，明反吴传启，暗反王关戚，对北大、对全北京市的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下令关押王力、关锋，实行重大战略调整时，对北大大多数师生而言，已具备了充分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准备。笔者和许多“公社”的师生们当时听到王、关倒台的消息，便一片欢腾、欢天喜地，特别高兴，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

本文开篇时所述大胖对笔者所谈：聂元梓在文革中提出解散校文革、本人辞职，是北大文革史中的重大事件。她后来挨整、北大分裂，中央文革挑动反聂反校文革，以及新北大反

左、反王关，迟群进校后对聂狼整，等等，皆与此事有内在关联。对此，笔者深以为然。笔者认为：抓住这一关键史实，由表及里，认清其实质，前前后后许多事情就豁然贯通了。

2018年6月3日

~~~~~

【生逢乱世】

“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

· 吴 敏 ·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犟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可以作为“老三届”的典型和代表。

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是一个使其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拐点”。俗话说“六六大顺”，然而，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我虽然不知道其他“老三届”和似乎很健忘的一般中国人，会不会将1966年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击而留下的深重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地剧烈疼痛一样。

“老高三”毕业至今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当然，极少数“老高三”或因出身于豪门、或因个人运气好而在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很顺利、很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我在和此类“老高三”接触时，一谈起1966年，他们亦是耿耿于怀、感慨系之。显然，这种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老高三”情结，浸透着浓重的社会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 “老三届”及“老高三”：一群被利用的傻小子、傻丫头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老高三”情结呢？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种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当“老高三”们走到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之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需要缺乏理性、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正处于青春躁动期，是一群吮吸着“狼奶”长大的傻小子、傻丫头，最适合于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

废弃了，包括“老高三”在内的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线。显然，在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看来，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标，几十万“老高三”、几百万“老三届”牺牲自己的学业，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好机会”。“红太阳”自己就没有上过大学，仅仅在师范学校毕了个业，可他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看不上眼，古今中外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比呢？

记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们班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冲刺。我们的毕业考试、体检、填报志愿等程序早就搞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十来天后就要冲上高考的战场了。由于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考前的畏惧感，而是满怀愉悦的心情企盼和设计着美好的未来。尽管同学们复习功课都很认真、很下功夫，但这主要不是出于害怕考不上大学的后顾之忧，而是想力争考一个好学校，以检验并证明自己的底功、能力和价值。有的已经被提前选送到新华社、外交部等单位去做“机要工作”的同学，这些天来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只等着过些时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学们刚刚坐到教室里准备复习时，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味俱有，很不是个滋味。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准备迈入“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绑架到了黑云翻滚、风狂雨骤的荒山野岭。而且，同学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按当时“文化大革命”风雨乍起、惊雷闪电的态势，半年之后进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势发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气氛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在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中学里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较之大学里要高很多。我们的化学老师赵崇印，就是在被其他班同学批斗之后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极大侮辱，硬是在单身宿舍里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而自杀的。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去到现场，只见屋子里的墙壁上尽是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我们的老校长郑云萍在挨批斗后不甘受辱也跳进了学校的水井里想自杀，因被发现得早而没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弄得他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文化大革命”初期，长治市各个中学几乎都发生了教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有所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经历了多场批斗，疲累至极，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学生拖在地上四处批斗，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不罢休，终于被活活地拖死了。全国各地中学里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且，中学里的“革命造反组织”很快就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联系到了一起，又是游行示威、围攻党政机关，又是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将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搅扰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黑权威”和“牛鬼蛇神”们都被搞得威风扫尽、“臭不可闻”。实践证明，被“红卫兵小将”等高帽子和受“红太阳”检阅等荣耀激励得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 上山下乡：“革命小将”被利用后的悲惨结局

高考“推迟”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由“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升级为翻来覆去的“夺权”和愈益剧烈的“全面内战”。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的“夺权”和“反夺权”（并不是反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反对由另一派夺权，要求由自己这一派夺权）争斗得非常激烈，在相当长时间里你来我往地呈僵持和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也逐渐升级，发展到了动用迫击炮、装甲车等武器装备真枪实弹地互相开火、攻城略地，双方背后的军队实际上也卷进去了。有的军人常常换上便装、带上抢枝弹药，参加到所在一派的“武斗小分队”里去“执行任务”。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一段时间里，三天两头

有打伤人、打死人的消息传来，大家当时似乎都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时不小心踩上了自己这一派埋下的地雷，当场就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学读高三，他们都曾被对立一派的“武斗小分队”抓去当了俘虏，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斗”甚至比我们这里还要厉害得多。在这种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最高决策者原先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根本没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到了1968年后半年，严重混乱的局面稍微平稳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券在握，不再需要利用“革命小将”们去上火线、打头阵了。但是，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这对于刚掌权的新贵们反而成了一种负面威胁。为了把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开去，最高决策者采取了一种很便捷的策略，就是把“革命小将”们打发到农村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山西省的工矿企业比较多，中学生原籍农村的也比较多，所以，1968年没有将“老三届”整体发配到农村去，而是将其分作了两部分：父母系农村户口者回老家务农，父母系城市户口或极少数情况特殊者被分配至厂矿当工人。父母亲都是农民的我，本该回老家“修理地球”，侥幸遇到了一个机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高三”为了生存而“飞鸟各投林”，累累若丧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着准备高考的情景完全成了遥远的隔世之梦，想都不敢想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散伙分别、各奔东西时，大家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连一张临别的全班集体合影照都没有留下。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过，除师范之外的中专学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数量也很少，许多县都是只招一个高中班，很难考），五年之后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至于恢复高考，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二年即1966年之后11年的事情了。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到了“而立”之年，绝大多数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所得收入极其微薄，而且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很艰难、很窘迫，有几个人能重振鸿鹄之志并丢老弃小、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惨重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过几个月以后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噫吁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 “老高三”群体在社会底层的痛苦挣扎

我爱人也是一个“老高三”，她的一个同班同学1977年时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下了很大决心准备参加高考以改变自己眼下的穷困处境，但步行几十里来到县城以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心把务农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受煎熬。于是，他到我爱人办公室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后，身心疲惫，情绪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根本没有去考场就打道回府了。我爱人的另一个同学倒是参加高考并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学，老婆、孩子在家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只好办了退学手续。类似此二位的经历，在“老高三”中决不在少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班30多个同学，我所知道的在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的只有4位，约占十分之一。而且，恢复高考后各大学录取学生有一个未成文的默契，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的年龄最大者，他们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学。可以想像，当绝大多数“老高三”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者纷纷走进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近乎全部地顺利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学者，基本上都到农村去参加了一年的“四清”，其在校学习时间和1965

级大体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1964级“老五届”曾亲口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个高中毕业，和你们差不多。”然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20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领导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官运亨通，而且由于他们的荫庇，其亲属们也大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摔到了社会底层；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又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要摊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在企业职工“下岗”的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家里买房子需要讨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倒霉事”的队伍里，大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当“老高三”们远远地仰视着并不比自己在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们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时，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 “老高三”群体在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悲怆命运

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过于巨大和强烈的精神刺激、心理压力，使得相当一些“老高三”愈来愈承受不住了。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宋克功，是一个比较内秀的文弱书生，他学习很用功，成绩很优秀，而且在政治理论上比较早熟。记得大约在读高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啃大部头的马列著作了，被同学们戏称为“宋克思”。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必定能考上名牌大学。1968年以后，他到一个工厂当工人，被分配的工种是开天车。因其胆子比较小，对高空作业很恐惧，他多次向领导要求改换工种，但他的顶头上司以“不安心工作”为由硬是不同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下了很大功夫自学中医，并在晋城县的统考中名列前三，具备了行医资格。他以此为据要求到厂医务室去工作，领导上还是不批准，仍然让他开天车，这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熬不出头了。再加之其他一些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所以，他于1976年一气之下回到乡下老家，关起门来上吊自尽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文静而寡语，学习成绩也很好，1969年被分配到煤矿当工人，在井下当了一年多挖煤工后被抽调到了本矿的科室工作，命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其妻子没有上过什么学，双方缺少共同语言，家庭关系很紧张。这位同学到煤矿工作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又难免要受老婆的窝囊气。在气上加气、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终于在1980年代跳楼自尽了。这两位同学寻短见的直接原因都与其特定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以及性格弱点有关系，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他们如此结局的真正根源还是1966年那场灾难。可以想见，在他们两人最后下决心走上绝路、命归黄泉之前，一定作过长期、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一定会多次诅咒1966年那个令其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可恶的年份。如果没有爆发“文化大革命”，他们两个在1966年正常地上了大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家庭环境，决不会年纪轻轻就走上不归路。

我们班30多个同学，1968年离校后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迄今为止我知道下落并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者只有20多个人，这些同学几十年来的人生之旅大都很坎坷、很悲凉（不知道下落的那7、8个同学，现实处境可能更加不如意。因为，按一般常规，处境较好者都会主动与同学们联系的）。在这20多个同学中，除上述已自杀者2人之外，20岁出头因公致残、双目失明、终身吃劳保者1人，40多岁、刚50来岁就病逝者3人，占了约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全国的“老高三”中决非偶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典型和普遍意

义，可以说是“老高三”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显然，将“老高三”群体同1960年代以来毕业的任何一届中学、中专更遑论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相比，同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包括战乱时期在内的任何一届中学毕业生相比，其命运的持久悲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自1966年以来，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幸运之神一次也没有顾及过“老高三”群体，而尴尬磨难遭罪之事则一次也没有把他们遗忘和落下。

◇ “老高三”群体：研究新中国磨难史的“活化石”

“老高三”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两三年，在1950年代伊始就朦朦胧胧地有些记忆了，是牵着共和国衣襟长大的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灿烂的朝霞，给他们的幼年、童年带来过短暂的欢乐和幸福，但“反右派”、“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使他们少年时就尝到了生活的不测和艰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混乱、动荡和阴谋、诡谲，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和烙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巨变及其愈益显露的负面代价，让他们的中年既觉得重逢机遇、愉悦欣喜，又感到不堪重负、心力憔悴和无可奈何。现在，“老高三”群体已是将近“古稀”之年了，已经步入了“夕阳红”的队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显然早就被“边缘化”了，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和贡献了。但是，在他们的身上，真实、清晰地保留和展示着新中国成立65年来寒暑冷暖、阴晴雨雪的“年轮线”。本文描述、储藏和展示这些“年轮线”，不是为了炫耀，不是在发牢骚，更不是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的苦难，而是想真实地倾诉和记述这段历史，想为对其感兴趣者特别是正对社会实践进程承担并发挥重要责任者，提供一份进行研究和参照的“活化石”。仔细观察和琢磨这块“活化石”，透视绵亘半个世纪之久的“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能对正确反思新中国成立65年来曲折、艰辛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国社会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而产生的诸种矛盾、困难及问题，得出一些有益的感悟、启迪和警示。

导致“老高三”群体半个世纪以来悲剧人生的祸根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呜呼，时运不济的“老高三”！呜呼，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都说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岁月，经历了清华大学文革磨难的罗征启先生质问：“如果说疯狂，我要问，好端端的一个共和国、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是谁先疯的？”）

□ 来源：《历史 de 天空》微信号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